

【书 评】

“寻找国家”

——清末民国时期蒙古地方精英国家认同的演变与形成

常 宝¹

一、中国历史上的“国家”与“民族”以及近代汉族精英的“民族主义”话语

在世界历史上，各个民族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创建国家形式，民族与国家成为互构的两种实体，中国的“国家”与“民族”也经过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尤其近代“国家”与“民族”的生成是一个复杂、多变的过程。

（一）“中国”与“中华”

据考证，“‘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初年。周人始兴之地在陕西关中，站在关中看全国，关中为‘西土’，而把新占领的中原称为‘中国’，这时的‘中国’一词还是一个地理概念”^{[1]56}。那时候的“中国”是指地理意义上的“中原”、政治意义上的“天子之国”及民族意义上的“华夏”民族。

就在与中原形成统一的“民族”趋势前后，北方游牧民族自战国末期，出现了东胡、匈奴、月氏三大势力互相兼并角逐的局面，并匈奴迅速统一北方游牧民族地区。随着历史与周围环境的演变，“中国”一词的涵义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至汉，产生了包括边疆民族地区的“古之戎狄，今为中国”的“中国”观念。至唐后，宋辽金前后并立，后来元灭金、南宋、西夏，天下一统，均自称为中国正统，融入了“中国”，参与了“国家”建构。

中国传统价值观与在历史空间、时间和文化认同上形成的“中国”概念是“国家”意识的发端，进而逐步形成了“国家”及其政权。在中国历史上，“国家”的形成离不开中国传统价值观和思想基础，中国“‘国家政权’是由儒家思想交织在一起的行为规范和权威象征的集合体”^{[20]21-22}。

与“中国”“国家”概念的形成一样，具有“民族”涵义的“华夏”一词的出现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夏、商、周三族至周代，逐渐融合为一个民族整体，呼为“诸夏”或“华夏”。

《礼记·王制》中有“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一句，而这里的“中国”，主要指的是周代存在着五大民族集团之一的“华夏民族”。“中国”一词，最早是指“畿辅之地”、“京师”，后来又与“华夏”同义。

（二）中国“民族-国家”

“据王树民和陈连开等先生研究，‘中华’一词起源于魏晋时期，最初用于天文方面，乃从‘中国’和‘华夏’两个名称中各取一字组成。在日后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具有了‘中国’、中原文化和汉人、文明族群等内涵”^[2]。由此，按照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理论，可将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推到早在魏晋时期。可是，这与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和涵义。

“中华”一词，经过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认同，以及元朝大一统的民族大

¹ 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内蒙古师范大学社会学民俗学院副教授。



熔炉局面，历史构成和打造了“中华”整体观念。“中国”与“中华”概念的形成实际上标志着传统儒家的、广泛的文化概念发生了变化，通过地理界限、种族、族群及其认同，重新划分了传统文化区域，开始以“民族”、“国家”替代和肢解了文化概念，为建构近代“民族-国家”道路打开了一扇门。

清朝满人制定和实施因地制宜的灵活政策，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国家与“中华”民族的形成。《大清一统志》载：则将蒙古、新疆、西藏、台湾均视为中国的一部分，由此可见，“中国”一词，其含义也从空间不断扩大至时间、意识、认同，并建构了立体型结构。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帝国主义侵华前夕，中国这个众多民族的帝国迈入近代国家阶段，出现了新的“国家”与“民族”概念。具体而言，清末时期一部分汉族精英从西方引入了具有一般性意义的“民族”概念，并确立其完整的“民族”观念和意识的结果。

（三）近代汉人“民族主义”话语

随着中国近代以汉人为核心的“中央”的逐步形成，中央对边缘地区的态度与策略首先在“话语”层面上以自由、松散形式得以展现，从而凝固成“话语”权力。“话语”是形成主体的因素和权力关系，也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

中国传统价值观，如“天下观”等思想是汉人近代“民族主义”的基础，也是近代国家政权的理论的来源。至清末、民国革命时期，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在“民族主义”和国家制度建设上从未放弃过从“天下观”、“和而不同”和有关“中国”认同的古代传统思想和意识形态中取经据点。

“民族主义”与“民族”一样，是起源于西方的概念。李慎之认为：“中国的思想是‘天下主义’而非‘民族主义’”。近代以前，中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民众心目中只有“天下”而没有“民族”、“国家”意识。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民族”与“民族主义”才成为了极其复杂的概念体系和意识形态。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意识和情绪在19世纪中期以后，尤其辛亥革命时期的新旧时代和政权的交替过程中获得了集中表现。梁启超曾在《戊戌政变记》中写道：“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王珂认为，清末时期，在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和政治人士中生成“民族主义”话语的原因和背景有两个：“其一是清朝政府已经实行了260多年的民族压迫；其二是在腐败无能的清王朝的统治下中国受尽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3]208}。

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主义。从文化角度看，清朝满人虽然是外族，但没有破坏传统中国一脉相承的文化价值体系，反而保存和发扬的很好。汉人要质疑和推翻满人和清朝政权，只能从“种族”观念入手，重新定义“国家”，以“民族主义”取代以往“天下”文化主义。因此，“民族主义”和“革命”成为贯穿整个清末民国时期的主题和嘈杂声音，形成了以“种族民族主义”为开头的立宪派和革命派以及不同理论趋向。

《左传》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说，即是从血缘上认同，有着强烈的排他性，“这句话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种族偏见’存在与中华文明的初期阶段的论断”^{[23]5}。

19世纪中叶，西方势力入侵，在外来势力的压力之下，民族观念有变化，尤其鸦片战争，更使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国家有新的认识。面对满清国家的衰弱，在当时的汉族精英、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和民众中自然形成了腐朽无能的清朝政府是革新的阻力的观点，以求有效的清除他们，从而否定满汉一体论，恢复“华夷之辨”的传统理论。章太炎、邹容都是这方面的代表者。尤其孙中山，获得了以“大亚细亚主义”为核心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激励和支持，在1894年成立兴中会，重新阐述明太祖朱元璋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并此为政治纲领。由此，“仇满”是当时最响亮的革命口号和“大汉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实际上，当时的“仇满”并不只针对当时的满族，“驱除鞑虏”的口号给蒙古族的心感冲击不亚于满族，由于鞑靼长期以来是包括蒙古在内的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通称。



20世纪初，“民族-国家”观念传入中国，中国人面临了如何对待和建立“民族-国家”的选择，即在近代中国国家建构以及版图的划定以及“中国”如何对待周边异族，是否容纳等问题并围绕是否改良、君主立宪，还是进行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是否满汉团结建设多民族的“大中国”，还是驱逐满人以建立“汉族的中国”（民族-国家）上知识分子精英中发生了一场激烈争论。为此，康有为提出了不仅包括内地18行省，还包括清朝统治下的全境的“大中国”概念，并与历史与现状、主观与客观条件、文化与实践几乎完美结合的这一理论成为唯一的“真理”，指明了中国近代国家建构的正确方向，并获得了历史的检验。

在容纳“异族”，建立多族群、多民族国家的前提下，汉族必定是主体，但还需要对民族整体和部分进行区分和解释。当时的革命派所主张和运用的“种族民族主义”和“单一汉族国家”的民族理论，使国家面临着民族分裂的危险。梁启超看到了这种危险，认为“民族主义稍输入于我祖国，于是排满之念勃郁将复活”^{[4]74}。中国各民族已“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5]4}。并提出了“大民族主义”与“小民族主义”概念，明确提出反对排满的“小民族主义”，提倡合满的“大民族主义”的主张。

辛亥革命已实现了“排满”，但组建近代国家问题上直接面临了是否只需要单一的汉族？还是以汉族为中心？如何巩固边疆？等重要问题。特别是面对北部边疆的蒙古问题，孙中山自然提出了“各族团结一心防俄”的主张，并致电在京蒙古王公们，表达了“实欲合全国人民，无分汉、满、蒙、回、藏，……究之政体虽更，国犹是国”的想法，抛弃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观念。由此，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对国内民族关系的认识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国家政治架构的建构上逐渐摆脱依靠单一汉民族的建国理念。一位日本学者一针见血地论道：“革命党起事之手段，是号召全国叛离清政府，鼓吹革命热潮的唯一口实就是种族主义。而在满洲朝廷灭亡之后，激进革命党人如再在一多民族的国家里鼓吹种族主义，就势必会危及其统一的基础。‘故彼等立即高呼消除种族界限，鼓吹种族团结’”^{[24]129}。

我们可以看出，西方主张的“民族主义”和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家所提倡的“民族主义”有很大的区别。西方“民族主义”更多地强调语言等因素，以区别不同民族（之后的共产国际组织也是如此），而清末民国初期的中国“民族主义”始终注重种族的统一性，在种族和血缘的关系中谈论“民族主义”。王国斌认为：中国“‘民族主义’（nationalism）则是一种介于省及国家之间的认同。中国关于建立一个国家的想法，乃是出于地缘及血缘关系。这与欧洲效忠国家的观念恰成对照”^{[22]222}。

二、国家与地方之间：汉人地方精英的“崛起”

清末时期，取消满汉通婚之禁（1901）等现象的出现预示着汉人地位的提高。随着清朝满人政权的逐渐衰败和式微，地方力量崛起，以汉族为主体的、抵触并旨在推翻满清国家政权的地方反叛和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在国家权力体系中汉人精英的地位明显提高，在国家决策中汉人的条陈和发言逐渐不容忽视，尤其汉人“军阀”的发展，说明汉人精英已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一）对蒙地决策的参与

在清末民国时期，随着满人国家力量的衰退以及世界与国内政治、文化整体格局的转变，汉人精英开始在国家权力体系中越发扮演重要角色。以清末蒙地全面放垦政策的制定过程为例，汉族出身的官吏曾经与蒙官、满官一道积极参与与废除移民禁令活动，纷纷上奏，促使了蒙古地区全境开放。

表1 清末官员的奏折与许可开垦的地域情况

年代	官职	姓名及族属	开垦地域
光绪十年（1884）	山西巡抚	张之洞（汉）	土默特
光绪十三年（1887）	——	恭澂*（蒙）	布特哈、默尔根、呼兰、北团林子间之



			通肯地方
光绪十六年（1890）	——	徐宗亮（汉）	黑龙江省
光绪二十二年（1896）	黑龙江将军	恩泽*（蒙）	扎莱特、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旗
光绪二十三年（1897）	山西巡抚	胡聘之（汉）	蒙古全境
光绪二十五年（1899）	黑龙江将军	恩泽*（蒙）	蒙古全境
光绪二十七年（1901）	山西巡抚	胡聘之（汉）	蒙古全境
光绪二十七年（1901）	绥远城将军	信格（满）	绥远
光绪二十七年（1901）	黑龙江将军	萨保 ——	哲里木盟
光绪二十八年（1902）	绥远城将军	貽谷*（满）	察哈尔、绥远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山西巡抚	岑春煊（汉）	察哈尔、绥远
光绪三十年（1904）	黑龙江将军	达桂 ——	哲里木盟
光绪三十年（1904）	盛京将军	增祺*（满）	科尔沁左翼后旗
光绪三十一年（1905）	理藩院左丞	姚锡光（汉）	蒙古东部地方
光绪三十三年（1907）	热河都统	廷杰*（满）	辽河中上游地方
光绪三十三年（1907）	两广总督	岑春煊（汉）	蒙古全境
光绪三十三年（1907）	东三省都督	徐世昌（汉）	热河、昭乌达、科尔沁
光绪三十三年（1907）	东三省都督	徐世昌（汉）	黑龙江省
光绪三十三年（1907）	科布多办事大臣	锡恒 ——	阿尔泰地方
光绪三十四年（1908）	东三省都督	徐世昌（汉）	整个蒙古

* 恭蹙，满洲正黄旗人；恩泽，蒙古镶蓝旗人；貽谷，满洲镶黄旗人；增祺，满洲镶白旗人；廷杰，满洲正白旗人。“——”表示“不详”。

从上表（表1）中看到，在清朝国家的蒙地开垦、“移民实边”决策背景下，不仅是多数满官和少数蒙古精英，一部分拥有巡抚、总督和都督官职的汉族精英也积极响应国家谋略，并采取了具体行动。这一方面说明国家力图整合地方的目的和愿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汉族精英势力在国家与地方权力体系中不断扩张的趋势，进而传递“游牧者，宜于封建而非可以大一统之治治之者也；耕种者，宜于郡县而可集权于中央以治之者也”（姚锡光）的观念，预示着权力的更替及转换。

（二）汉人军阀的产生

军阀的产生也是近代汉人崛起的主要标志。近代以来，清朝国家先后两次败于鸦片战争，后又败于日本以及八国联军。缕缕出现的战败和随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不仅严重消耗了国家财源，其对民众和地方的掌控能力也大大下降，威信全无，以汉人精英为主体的地方势力看国家如此软弱无能，都在寻找机会，试图独立以割据一方。

1901年慈禧政府进行“新政”，力图恢复中央的威信，但由于政策不对头，如同打开了“潘多拉”，不仅将清朝国家埋葬，也促成了民国时期汉人军阀的产生和混战局面的形成。1912年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袁世凯统帅北洋新军前去镇压，孙中山以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之位想让，换取了袁世凯的反戈，后清宣统帝被迫退位，汉人推翻了满人帝国。

在清末民国时期地方崛起以及社会近代化过程中，南方汉族精英功绩卓越，魏源的“师夷长技”的思想和左宗棠的“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精神是当时汉人地方精英特有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忧国忧民”的民族精神。

罗志田认为：“有意识地在政治中运用民族主义，甚至在北洋军阀统治之前就已见端倪”^{[8]171-172}。军阀的发展，尤其北洋军阀的权力运作过程与当时的蒙古地区社会发展、政治演变和精英行动有着复杂、紧密的关联。民国时期汉人军阀与蒙古地方精英，尤其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隔阂不断发生，他们之间的关系对蒙古地方社会的发展、变迁与精英国家认同产生了深刻影响。

首先，北洋军阀捍卫民国国家统一的立场十分坚定，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蒙古王公精英阴谋策动外蒙古独立的关键时刻，时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派得力干将徐树铮亲赴库伦，并收复外蒙古，外蒙古呈请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中国的版图在辛亥革命后

创造了空前的完整局面。皖系徐树铮的成功，即权力范围的扩张，引起久把蒙疆视作自己势力范围的张作霖忌恨，蒙古地区成为各类军阀的竞争之地。

其次，在蒙古地方精英与汉人之间一直保持争夺和张力，军阀对蒙地的剥削和压制引起了地方的抗争。北洋军阀时期的热河、察哈尔和绥远等蒙古地区，在行政在制度上清朝“盟旗”制度已转变为将军都统监督下的“盟旗”制度，权力职位频繁更替，走马灯似的人员变更，令人眼花缭乱。仅在袁世凯以后的十年中，每个地区都统官员更换率达到平均一年一次，呈现出清一色的汉人各派高级军官的阵容。可见，当时蒙古地区的政权争夺如内地各省一样，十分激烈，地方与军阀之间的关系复杂、多变。从上述三个特别行政区都统的任免背景可以发现这一特点（表2）：

表2 北洋军阀混战时期三地区军阀与都统更替情况表

	所属军阀	都统
热河地区	奉系	汲金纯（1921）
	直系	王怀庆（1922）
		米振标（1923）
	奉系	阚朝玺（1924）
	直系	宋哲元（1925）
	奉系	汤玉麟（1927）
察哈尔地区	皖系	田中玉（1916）
		张敬尧（1917）
		田中玉（1918）
	直系	王廷楨（1919）
	奉系	张景惠（1920）
	直系	谭庆林（1922）
张锡元（1922）		
	张之江（1924）	
奉系	高维岳（1927）	
绥远地区	皖系	蒋雁行（1916）
		申葆亨（1917）
	地方	王丕焕（1917）
	直系	陈光远（1917）
		蔡成勋（1917）
	地方	马福祥（1920）
	直系	李鸣钟（1925）
		蒋鸿遇（1926）
	阎锡山	商震（1926）
	地方	满泰（1927）
奉系	郭希鹏（1927）	
	汲金纯（1927）	
	满泰（1927）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统一。内蒙古地区行政体制由将军都统监督下的“盟旗”制度又一次转变为省县管理下的“盟旗”制度，北洋军阀军政大权争夺暂时终结，蒙古地区落入了更强大的军阀——蒋介石的统治。

无论在北洋军阀时期，还是国民革命时期，汉人军阀在蒙古地区的势力日益强大，侵占大量土地、草场。以冯玉祥为例，自从倒戈后，一直以西北边防督办名义，把察哈尔、绥远、宁夏这三个特别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其权势波及到了整个蒙古地区。冯玉祥为了解决军用粮食、保障士兵们的生活，在西北和蒙古地区大量开垦，蒙古民众的生活以及传统王公贵族的地方权威受到了威胁。

军阀与商人、当地王公勾结，以侵夺蒙地为致富的方法，这种情形从清末已经开始。在东北，张作霖与常住奉天（沈阳）的那木济勒色楞王爷商定开垦该旗的大片草原为农耕地，到1928年



达尔罕旗四分之三的土地被放垦，牧场缩小，牧民被迫背井离乡，引起当地牧民的强烈不满。著名的“嘎达梅林起义”就发生在那个时期。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当时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的处境，同样也能够证明蒙古族地方精英与汉人军阀之间激烈矛盾和争夺的情形。汤玉麟统治热河时期，“热河成了鸦片种植的场所，……又把位于昭乌达盟巴林右旗境内契丹辽陵的古物劫去据为私有。……当然这种蛮横也深深地刺激了这两盟的知识青年，使蒙汉之间的界沟更为明显。……后来在1933年，内蒙古自治运动之际向德王投效的蒙古青年，以这里出身的居多数。汤玉麟的横暴恐怕也是促成这一行动的一个主因”^{[16]44}。因此，“有人问德王：大家反军阀都是一样，蒙古又何必特别强调民族主义呢？他总是以‘汤玉麟治热河，在汉人之中只引发反暴政的心向。坏蒙古王公欺压蒙古人也是一样。但是汤玉麟是汉人，由他来对蒙古人施以高压，其引发的不只是反暴政的心向，而是点燃起民族主义的火苗’为答”^{[16]44}。后来，德王在与傅作义的争夺中也始终处于下风。1936年2月，“绥境蒙政会”在傅作义与阎锡山代表的监临下成立，成为消解德王“百灵庙蒙政会”的对立因素。

三、蒙古地方精英的“叙述”与近代国家认同演变及其行动

中国近代以来的巨大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迁直接影响了北方蒙古地区社会的全面变革，具体而言，清朝帝国的逊位、汉人“民族主义”的兴起和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华民国的建立和汉人军阀等地方势力的崛起，对蒙地政治地位、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等诸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随之蒙古地方精英和民众的国家认同、地方主义与族群意识也发生了演变，使得当时蒙古地方精英社会行动出现变异，社会发展、民族关系面临了新的危机和问题。

（一）两种“叙述”

在清末民国不断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力度的过程中，国家与地方、地方精英之间的权力和利益关系发生了变化，并创造出的一系列叙述结构以及话语权力。

蒙古地区绝大多数王公贵族和地方精英利用“现代”或“传统”的观念和叙述来顺应或抵触国家权力，即地方精英通过新型渠道和旧有的“传统”方式，力图保持地方利益，提高在国家决策中固有的地位。当然，“现代”与“传统”在这里并非泾渭分明，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地决定着蒙古地方精英是生活于传统还是现代的角色和理念。

蒙古地方精英们对清末国家“新政”的反应千差万别：不少王公精英坚决拥护清朝政权、抵抗“共和”的同时，也有许多接触新事物的蒙古王公精英们积极响应国家政策，主张向开明的汉官学习，提出了很多有针对性的变革图强主张，成为蒙古近代化的推动者，达到了努力成为社会主流和精英的目的。换言之，蒙古地方王公与精英集团也与当时其他地方精英一样分化成类似于杜赞奇所说的“保护型经纪”和“赢利型经纪”等代表不同利益倾向的群体。

1. “现代性”叙述

清末民国时期，在中国精英中出现的“现代性”并不是完全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性”，而是在社会与观念变迁情形下，描述一种新型、开拓性方向的概念。清末民初，西方的思潮和中国社会运动第一次使蒙古地方精英觉醒，激发了开创、自觉的意识以及社会使命感。

蒙古地方“族群民族主义”的“现代性”叙述表现在地方精英不同领域的行动中：如教育、文化、军事和经济等。

喀喇沁右旗札萨克郡王——贡桑诺尔布，在该旗推行了“新政”，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他认识到：“西欧的英、法、德、美等新兴国家，前后改革了陈腐旧制，从而形成了现今的列强，我们蒙古民族因为仍然存在腐败的制度，就变得愈发软弱无能”^{[9]8}。它还认为，“日本等西方民族与蒙古民族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随着时代的演变’，都会‘由落后逐渐走向文明’的”^{[10]329}。

贡桑诺尔布还认为：“查自古以来，不论何种民族，随着时潮的演变，都是由落后逐渐走向



文明。例如汉族，虽然居住在中原地区，气候适宜，物产丰富，但在古代轩辕皇帝以前的时期，他们仍然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在此后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很多英明皇帝和古圣先哲创造文字和文化，教育全体民众，才形成了现今的文明民族。……日本是一个东海岛国，在他们英明皇帝明治时代，周游各国，变法维新，振兴工业，数十年间，国富民强，比我们清朝这样一个大国还要强盛的多，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11]3}。由此可见，贡桑诺尔布把民族的文明与否归因于是否有先进的教育。汉族的文明，日本的国富民强都是因为全体民众受到了“教育”。

哲里木盟科左前旗科尔沁郡王——棍楚克苏隆，1910年到“北京贵族子弟学校”就读，学习期间深受康有为、梁启超推行新政思想的影响，主张维新主义，就如何自强提出四条建议：“取缔宗教、以祛迷信；振兴教育、以开民智；训练蒙兵、以固边圉；择地开垦、以筹生计”^{[13]223}。

1910年，科尔沁左翼后旗札萨克亲王——阿穆尔灵圭提出：“整顿蒙疆宜先勘修铁路”^[14]。“他以‘重在增殖蒙人生计’为宗旨，联合其他王公出资创办的‘蒙古实业公司’，从兴办蒙古地区的交通运输业入手，再向经营其他行业方面发展”^{[15]10}。

罗卜桑却丹也与上述王公、思想家一样，是一位主张向西方寻求真理，吸收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思想，试图改变蒙古民族贫穷落后的现实，振兴民族的思想家。他曾经向王公掌权者提出发展蒙古文化教育和改变传统游牧经济经营模式的建议。

2. “传统性”叙述

传统，包括一个族群传统文化、历史及其认同形式，对蒙古地方族群精英来说，“传统”意味着寻求族群的起源、歌颂始祖，并对传统封建制度、权力、祖先辉煌历史记忆、土地与族群文化的认同、痴迷、继承和保护意识。

(1) 地域认同：祖先安息的地方

对故土的热爱，就如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强调的“原乡感情”是人类固有的情感，不是“民族主义”创造了它，而是挖掘和利用了它。

蒙古族世代繁衍生息在蒙古高原。就像犹太人“把土地视为宇宙的立柱和中心”一样，蒙古人依然眷恋那已尘封，已被历史淹没的遥远的13世纪和记忆中的伟大“帝国”及其广阔的土地。

在维持族群的区隔上，地域扮演关键性的角色，“没有地域，民族意识(nationality)不足以成为一个民族(nation)，一个民族也无法成为一个国家(state)”^{[21]81}。在近代蒙古人看来，故土不仅是他们现今生存的地方，也是祖辈们最后安息的地方。祖先+安息+地方，这是蒙古人“血缘”认同与“地域认同”相结合的典型表现，也是蒙古地区传统“族群民族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接轨的表现。直到1937年10月，德王在绥远(今呼和浩特)建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并通过的《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大纲》第二条中仍提到“蒙古固有之疆土”之词。后来，札奇斯钦解释为：“所谓‘固有之疆土’，其伸缩性甚大，甚至包括内外蒙古、新疆、青海蒙古、布里雅特和其他已入苏俄版图的蒙古地区，都在内。所谓满洲国境内的蒙古疆土，也是在这个‘固有’的范围之内”^{[16]244}。当然，从那时的实际情况看，这只是理想或奋斗目标，是一种政治抱负。

(2) 文化认同：游牧是根基

盖尔纳认为族群意识可以转化为“民族意识”，族群问题可以转化为“民族主义”运动。“社会中的‘族群’不但具有自己的文化特征，而且还需要具有相对固定和公认的‘领土’(传统的具有一定程度排他性的本族集中居住地)和本族群自己的发展历史”^{[6]107}。正因为蒙古地区具备了历史、文化和领土的条件，20世纪蒙古地区建立政治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想像”和诉求是以完备的历史文化因素为支撑的。

众所周知，与工业和商业经济不同，游牧和农业经济更依赖于自然环境和人口因素。外来异文化和强权政治不仅破坏了蒙古人生存的自然环境，也侵蚀了传统游牧经济和族群文化的根基。



面对如此局面，蒙古地方族群精英和传统势力，自然怀旧和向往祖先辉煌历史和固有的制度体系，“族群民族主义”油然而生。不仅是蒙古地方族群精英，当时国家层面的思想家如梁漱溟、陶行知、晏阳初等人也看到了国家权力的过于渗透以及现代国家对地方造成的破坏性、悲剧性影响。

(3) 历史认同：对过去的重建

尹湛纳希(1837-1892)，蒙古族近代最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思想家。他在史学研究方面，主张尊重历史真实，严厉批评那些从“偏心和嫉意”出发肆意“曲解事实”的做法，追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尹湛纳希批评朱熹的《紫阳纲目》中明代读写、校订、批注的史官从“偏心和嫉意”出发，“信口开河，随心所欲诋毁蒙古人，任意篡改《通鉴纲目》之原意，诋毁这部正史使其失去真谛”使之“变成了充满泼妇骂街的东西，达到了歪曲事实的顶点”^{[10]260}。“尹湛纳希以元朝一百六十二年，清朝二百年的历史事实驳斥了他们编造的‘北方人没有百年之帝之福’的烂言，严正指出这是‘从他们的嫉妒之心和小人的偏心出发，任意诋毁正史的大罪’”^{[10]260}。尹湛纳希在明代史学家歪曲和肆意篡改蒙古人历史的问题上进一步表达出他重视蒙古人真实历史的民族情绪，指出：“‘让所有的蒙古人都能知道子自己的历史’，并且使天下人‘知道蒙古人的历史真实’”^{[10]260}。可见，对“历史真实”的强调是精英们塑造和建构族群同一性、集体意识的重要手段。

德王，作为一名蒙古王公中的极端保守派人物，是地地道道的蒙古“民族主义”、“复土主义”者。他始终以“民族复兴”或“民族重构”为目标和己任。“德王是世袭的苏尼特右旗札萨克亲王，为了维护他这个阶段的封建贵族统治地位，他自幼就富有很大的政治野心，常以成吉思汗家族第三十世孙自居。宣称他要继承先祖‘成吉思汗之业绩’，来振兴统治整个蒙古”^{[17]3}。

1940年8月，德王在张家口举行“蒙古王公会议”，会上通过五条纲领，其第一条就是“缅怀太祖之伟业及发扬其传统精神，谋求民族之复兴”。在德王的认识中，成吉思汗以及13世纪蒙古人的历史被理想化，对他来说，他的使命在于重新回到蒙古人的过去，并重新获得曾经失去的辉煌和美丽传说。

民国时期的蒙古精英对“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不仅基于蒙古历史、传统文化的深厚背景，也受到了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理念的影响。从其性质上看，蒙古地方精英们似乎在“盗窃”西方民族主义“专利”的同时，还将民族主义与自身社会问题和文化需要相结合起来的。

(二) 国家认同及其行动

1. “留恋”满人清朝帝国

武昌发动了反清起义，一夜间全国范围内接连兵变、起义，纷纷通电响应。面对清朝即亡、共和将兴的局势，受到清朝更多恩宠的蒙古王公精英们，既不情愿、也不甘心。所以，他们便开始为挽救清朝、维护自身利益而奔波。同时，清朝也想利用他们在蒙古的地位和影响，以延缓自己的统治效力。

由那彦图、贡桑诺尔布、博迪苏等驻京蒙古王公倡导，于1911年12月24日成立了“蒙古王公联合会”（亦称“蒙古同乡联合会”）。“联合会”成立不久，由资政院议员那彦图、贡桑诺尔布、多尔济帕拉穆、博迪苏4人牵头，内外蒙古24名显赫王公世爵署名，以“蒙古全体代表”的名义致函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申明了政见，表示蒙古藩部仍然忠于清朝，要求袁世凯不要向南方革命党让步。与此同时，驻京蒙古王公还以内外蒙古十盟部一百三十五旗的名义，由科尔沁图什业图、达尔罕、卓里克图三亲王及喀尔喀三汗并赛音诺颜亲王等联合署名，致电当时南北议和的民军代表伍廷芳，表示反对共和、拥戴清朝，并攻击革命党人是“狭隘民族主义”。

袁世凯被清朝重新起用、掌握了军政人权以后，便想借南北对峙、政局混乱的时机，篡夺全国政权。清朝由隆裕太后主持召开了一系列讨论王朝最后命运的“御前会议”，宣布同意召集临时国会，通过国会投票决定国体。出席“御前会议”的除了清朝皇族近支王公和袁世凯或其代表以外，还有那彦图等几个蒙古王公中的主要人物。自1912年1月17日至23日，隆裕太后又召

集皇族近支、蒙古王公及袁世凯内阁的主要成员举行了“御前会议”，但“‘因有在京蒙古王公中数人多不谓然，未能定义’。科尔沁宾图王说：‘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袁世凯夙有异志’，‘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今已起用袁世凯，大权已归于彼，奴才等虽有效忠之诚，亦实无能为力”^{[12]192}。19日，当袁内阁代表提出在天津另组临时统一政府时，遭到“满、蒙的王公亲贵，一致反对”。蒙古王公们表示“若以中国国体而论，本宜于君主，而不宜于民主。惟今日全国人心既皆坚持共和，且各亲贵亦多赞成此事，我辈又何所用其反对。今惟全听御前会议如何解决，如决定共和，我蒙古自无不加入大共和国家……”。可见，当时蒙古王公精英们对清朝皇权的“忠诚”和“留恋”程度。甚至，至1935年，德王访问伪满洲国新京（长春）时，也会见了溥仪，还行了三跪九叩之礼。溥仪还以满洲帝国皇帝的身份封赠德王为“武德亲王”。

2. 有条件地接受“共和”

1912年2月6日，在袁世凯邀集的皇族近支、蒙古王公、军政大员的会议上，蒙古王公们又表示：“某等对于君主、共和并无成见，只要双方和平了结，则为我五大族之幸福。况朝廷已欲颁诏共和，某等敬谨遵旨，决不反对”。不难看出，这两段话充分表露了蒙古王公对于接受共和虽极不情愿，但是又螳臂无力、百般无奈的心境。

与此同时，鉴于清王朝大势已去，蒙古王公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又直接向南方革命势力提出了意愿和要求。当蒙古王公顽固坚持反动态度时，孙中山、伍廷芳曾分别致电，晓以五族共和之大义，规劝他们拥护民国。南方革命领袖孙中山于1912年1月28日亲自致电贡王、那王等蒙古王公。电文阐明五族共和之真谛，规劝“通告蒙古同胞，戮力一心，共图大计……勿误会而僨事；并请速举代表来宁，参议政要，不胜厚望。”提醒新的中华民国必须考虑到他们的特殊利益，维持蒙古的旧制度。

投靠袁世凯的蒙古王公，以阿穆尔灵圭和那彦图为首，其中包括曾声言要与民军逐鹿中原的帕勒塔。他们得到了袁世凯的信任和奖赏，转眼间又成为蒙古封建贵族精英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主要政治代表。民国以后，阿穆尔灵圭仍然充任“专办蒙旗事宜”职衔，并于1912年10月代表北京政府出席了在长春召开的“哲里木盟十旗王公公议”。那彦图于1912年6月受任乌里雅苏台将军，拟代表北京政府赴库伦谈判取消“独立”。在民国初期的政治舞台上，他俩还分别被拥护袁世凯的进步党推为名誉理事或理事，并且几乎不间断地充任各种名目的参议员、议员、参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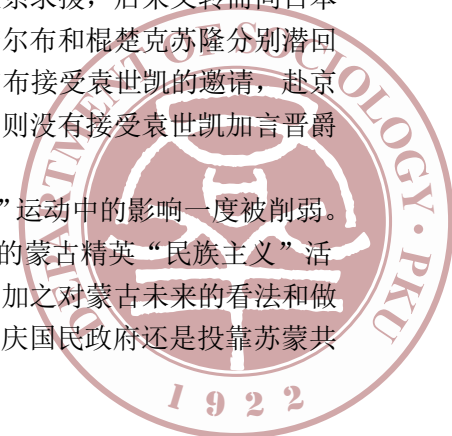
3. 认同“真空”——主张“独立”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风雨飘摇。沙俄见有机可乘，立即支持和策动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王公精英，上演了一幕成功的“独立”运动。11月30日，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在库伦宣布“独立”，成立“大蒙古国”。

外蒙古的“独立”，对当时的中国国家政权来说，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和伤痛。外蒙古宣布“独立”之际，在内蒙古地区多数王公中出现了国家认同“真空”局面，王公们立即支持和响应“独立”，甚至贡桑诺尔布和棍楚克苏隆等王公精英一度被卷入“独立”的风潮。

早在1912年初，贡桑诺尔布和棍楚克苏隆曾与俄国驻华使节联系求援，后来又转而同日本帝国主义接洽，并同日本方面签订了借款和购买武器的合同。贡桑诺尔布和棍楚克苏隆分别潜回本旗图谋起事。他们策动的“独立”活动遭到失败。后来，贡桑诺尔布接受袁世凯的邀请，赴京当了军阀政府蒙藏事务局总裁，开始了新的政治生涯。而棍楚克苏隆则没有接受袁世凯加言晋爵的引诱，而是秘密投赴库伦一度担任“副总理大臣”。

随着国家政治中心的南移和观念的变化，蒙古王公精英在“独立”运动中的影响一度被削弱。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后，德王等一部分蒙古精英聚集在北平，北平的蒙古精英“民族主义”活动再度活跃起来了。但他们之间仍有东西部蒙古精英的划分和分歧，加之对蒙古未来的看法和做法各不相同，内部矛盾和冲突逐步显现出来了。首先，他们在依靠重庆国民政府还是投靠苏蒙共



产组织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当然，以德王、吴鹤龄、札奇斯钦等人仍主张投靠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继续商讨蒙古地区的未来命运问题。具体地说，通过不断交涉，保留“盟旗”制度，甚至要获得蒙古“高度自治”权力。而一部分人在共产组织的影响下从北平转到张家口，加入了共产党革命组织。其次，投靠政府的蒙古精英内部对蒙古未来发展图景的想法和建构国家与蒙古地区之间关系问题上观念不一，如以荣祥为代表的绥远、察哈尔、热河地区出身的精英与德王、以及东部的阿思干、哈丰啊、特木尔巴根等人的未来设想和与国民政府谈判的要求和态度不同，甚至在从各地选取国民大会代表的问题上出现许多摩擦和冲突，从而蒙古精英们意志消沉、大大丧失其斗志。尤其白云梯、吴鹤龄等关键人物之间的权利欲望和奋斗目标的迥异，导致在北平和南京活动的蒙古精英屡屡遭到妥协和挫折。可见，在不同阶层、精英中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内容和性质不同，清末民国时期蒙古精英中的“民族主义”是复杂、多变的。那些蒙古王公精英强烈的族群认同和“独立”行为，不仅受到了国家权力的阻止和镇压，也使他们在国家权力体系中丧失了一定的信任。

4. 参加“革命”

(1) 国民“革命”

蒙古地方王公精英在社会变迁和思潮的冲击下，如孙中山“三民主义”、“五族共和”思想使蒙古王公精英看到并拥有中华民国是由中华民族所构成的观念和遐想，使他们的“民族主义”与“国族主义”融合，改变了他们的观点和奋斗方向。

随着清帝王朝的远去，蒙古传统王公精英的势力渐渐衰退，以国民党与共产党革命组织为中心的激进派精英人物越来越活跃起来，逐渐替代了原有王公的角色。

国民党当政以后，随着热察绥三省的正式设立，蒙古地区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革命形势进入高潮。一部分非贵族出身的政界人士被推到北京、南京的国家权力舞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吴鹤龄、白云梯等人。这批激进的“新上层”，不同于忠诚清朝的传统王公，又别于“民族独立”分子，他们承认和维护新政党的权威，积极参加了“革命”活动。

“内蒙人士接受中山先生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发生关系最早，且历任中央委员要职者，乃恩和巴图、白云梯、克兴额三氏是也。三氏初均为蒙籍，……深得中山先生之嘉许”^{[18]525}。“民国十三年，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派白云梯氏往内外蒙古宣传三民主义，进行党务工作”^{[18]525}。

白云梯是一位喀喇沁右旗出身的积极分子，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重要决策者。他曾在北京的政法专科学校读书，在蒙藏学校担任职员，在北京大学深造的，留日归国的温和“民族主义”激进分子。他后来到蒙古地区参与民族独立运动，在德王蒙古联合自治时期曾与德王合作过。

在这些蒙古新型精英和各盟旗地方精英的努力下，以“反对改省”为肇端的一系列请愿、游行活动在北平和南京的政治舞台上上演，至1930年，南京政府被迫召开全国性“蒙古会议”并曾颁布《蒙古盟部旗组织法》以及后来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和《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条例、制度性文件。与此同时，蒙古精英们也为渗透国民政府和挑战国家精英而付出了巨大代价。呼和巴图尔（韩凤林）的被害和时任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的尼玛鄂特索尔被日本人暗杀的事件充分证明蒙古地方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复杂、微妙、不稳定关系的本质。

(2) 共产“革命”

蒙古共产党员精英也是激进的革命分子。在北平诞生的蒙古共产党是与当时的“蒙藏学校”有密切关系。以北京蒙藏学校为中心的一批内蒙古青年知识分子，开始走上了寻求阶级和民族解放的道路。在共产国际、外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共同支持建立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骨干分子都是在当时的北京受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潮影响的青年激进分子。对当



时的蒙地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反帝、反封、争取民族平等和自治的社会运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北京蒙藏学校也是蒙古共产党精英的发祥地。共产党理论家们极为重视北京“蒙藏学校”，将其用作组织培训基地，使激进学生与知识分子深受马克思主义、新文化思潮影响，为其在蒙古地区进一步扩大影响打下精英基础。当时在蒙藏学校的蒙古族学生中有云泽（乌兰夫）、奎璧、吉雅泰、多松年、李裕智等人。他们不仅在北平开展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活动，也与蒙古地区革命活动密切联系，1923年5月，他们积极参与在绥远发生的“盛记”洋行的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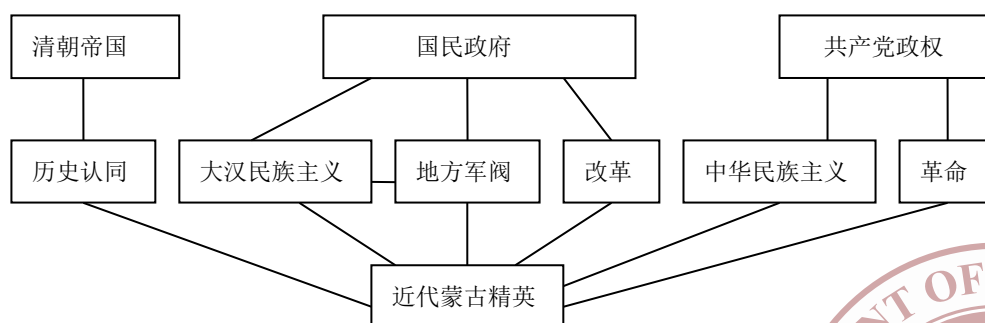
从1923年冬开始，陆续有来自内蒙古西部土默特旗的多松年、李裕智、吉雅泰、佛鼎、云润、云泽（乌兰夫）、奎璧等10余人在蒙藏学校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还有来自内蒙古其他盟旗的王秉章（字瑞符）、吴文献（又名吴子征、乌子贞）、白海风、纪松龄、乌勒吉敖喜尔、特木尔巴根等分别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或共产国际直接领导的革命活动。1924年以后，又有白海风、王瑞符、佛鼎、奎璧、多松年、云润、云泽、贾力更、高布泽博、特木尔巴根、乌勒吉敖喜尔等被中共北方党组织选送到广州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学习，他们成为第一批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蒙古族精英。

在蒙古地区社会革命中，从蒙藏学校毕业的学生始终扮演关键角色，正如乌兰夫所说的：“中国革命由五四运动青年知识分子起了带头作用，而蒙藏学院（校）学生对内蒙革命所起到的带头作用特别大。”，在当时，“学生，在校是学生，到了街上，是教市民救国的好教员”^{[19]80}。

四、结语

清末民国时期蒙古地方精英国家认同的演变与形成过程，是当时的世界政治、国家权力更替与国内民族关系性质的直观反映。具体而言，清末民国时期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演变、在西方帝国入侵和清朝衰败背景下出现的汉人“民族主义”情绪和“军阀”的形成以及“革命”风潮，使得清末民国时期蒙古地方精英们陷入了史无前例的复杂、恶劣的政治环境和认同危机，面临了清朝帝国、国民政府和共产党政权等多重政治实体的权力压力及诱惑（如下图）。

图 清末民国时期国家权力格局示意图



在这样的政治条件下，清末民国时期蒙古地方精英们拥有了多重国家认同。清末，蒙古王公精英清楚地看到清朝退位已属不可逆转的局势，于是一部分王公转而投靠新主子，公开打出了拥护“共和”的旗号。到了民国中后期，各派精英进一步分化，又一部分王公精英则表现出完全不认同民国汉人政权的态度，通过私下活动，想从民族“独立”中另寻出路，即呈现出“保皇——共和——独立——革命”的多变的认同发展轨迹。



后来,在日本人统治时期,喀尔喀亲王那颜图等人感到畏惧,一部分精英,如当时担任蒙藏学校校长的敖云章等人仍与国民党保持密切联系,当时在北京大学学习的札奇斯钦等人主张与日本方面接头,以保护“同乡会”。也有一部分人,如赛音巴雅尔(包悦卿)暗中与苏联大使馆联系,“其目的则在怎样能导入苏俄与外蒙的力量牵制日本在内蒙的活动,以及为将来内、外蒙合而唯一的瞻望部局”^{[16]257}。

历史事件充分展现了国家政权更替时期蒙古王公精英们的认同倾向、自我定位、政治立场及主动或被动承担的角色。蒙古王公精英们在清末民国时期复杂多变的政治博弈和利益关系中,一时颇有手足失措之感,曾在“寻找国家”的道路上极力奔走。

参考文献:

- [1]何志虎.康有为的“大中国观”与革命派放弃“驱除鞑虏”口号.史学月刊.2000.
- [2]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评论[香港].2002[2].
- [3]王珂著.冯谊光译.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 [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
- [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
- [6]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7]徐勇.近代中国军政关系与“军阀”话语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
- [8]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9]政协赤峰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赤峰市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1986.
- [10]吴国骥.蒙古族哲学史.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4.
- [11]讷古单夫.贡桑诺尔布传.赤峰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86.
- [12]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二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
- [13]那·阿拉坦莎.蒙古族近现代名人传略[蒙古文].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
- [14]宣统政纪.卷27.宣统元年十二月庚寅.
- [15]东方杂志.7卷.
- [16]札奇斯钦.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 [17]卢明辉.蒙古“自治运动”始末.内部资料[上、下].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1977.
- [18]黄奋生.蒙藏新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38.
- [19]裴小燕.内蒙古地区蒙古民族解放运动初探.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四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
- [20][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 [21][美]哈罗德·伊罗生著.邓伯宸译.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22][美]王国斌著.李伯重、连玲玲译.转变的中国.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 [23][英]冯客著.杨立华译.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 [24][日]宗方小太郎.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近代裨海.第12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